

论衡

何为“弱德之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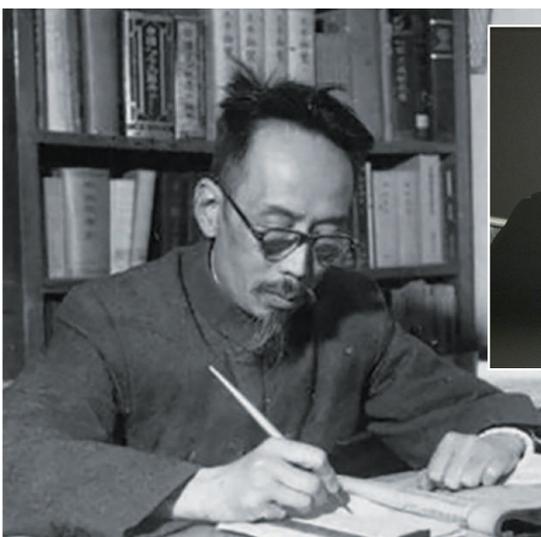
叶嘉莹

我是一个终生从事古典诗词之研读与教学的工作者，平时所阅读过的古今词人之作不可谓为不多。无论其为婉约豪放、典雅俚俗或是正统新变，其中自然不乏令人赞赏和感动的佳作。而在如此众多的各色各样的作品中，石教授的《荔尾词》却别具一种迥异于众的不平凡之处。

关于这种不平凡之特质的形成，我以为最主要的因素是石教授生而具有着一种特别善于掌握词之美感的、属于词人的心性。约言之，词体中所表现的，乃是较之诗体更为纤美幽微的一种美感特质，清代常州词派之开创者张惠言，在其《词选》一书中就曾提出，词之特质乃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可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晚清的名学者王国维，在其《人间词话》一书中，也曾提出“词之为体，要眇宜修”，因此要想写出真正属于词之特美的作品，那么我们首先所要求的，就是写词的人要具有一种具含纤柔善感之特质的词人的心性。而石教授作品中所表现的，可以说就是这种词人之心性与词体之美感的一种自然的结合。

据石教授在其所自撰的题为《忧谗畏讥——一个诗词的故事》一篇文稿中之叙述来看，他自幼就是一个敏感而多忧思的少年，生长于一个人际关系极为复杂的大家庭中，身为穷房子弟的他，所受之于父亲的教诲乃是忍耐和承受。而在他所阅读的小说中，最能引起他共鸣的则是小说中的一些弱者的的心声，如《红楼梦》中林黛玉所写的《柳絮词》、《聊斋·诸生》一篇中李遇云所吟的《浣溪沙》词。这些情思石教授统称之“为忧谗畏讥”之情，而这应该就是石教授何以将其自叙个人写作诗词之经历的一篇文章，题名为《忧谗畏讥——一个诗词的故事》的缘故。私意以为，“忧谗畏讥”这一题名颇有两点深义可供沉思。

第一点可供沉思者，乃是这四个字确实触及到了词之美感的一种特殊品质。关于此种特质，我在前文已引述过张、王二家之说，不过仍嫌不够彻底，他们都只能但言其然，而未尝能深言其所以然。所以这些年来我对于词之美感特质的形成之因素，曾经颇作了一些反省的思索。首先于1991年，我曾写了一篇题为《论词学中之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的长文，以为词之特美的形成，与早期歌辞之词中的女性叙写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后我于1993年又写了一篇题为《从艳词发展之历史看朱彝尊爱情词之美学特质》的长文，对词之美感特质作出了一些更为触及本质的探讨。在该文中我曾对于此种本质试拟了一个“弱德之美”的名称，以为《花间》词中之女性叙写固然是一种“弱德之美”，即使是豪放派的苏、辛词之佳者，其所含的也同样是“弱德之美”，而且曾尝试加以申论，说“这种美感所具有的，乃是在强大的外势压力下所表现的不得不采取约束和收敛的一种属于隐曲之姿态的美”。如此我们再反观前代词人之作，



叶嘉莹尤推崇近代词人石声汉先生的《荔尾词存》，认为无论是词人还是词作，均完美体现了“弱德之美”

石声汉（1907—1971），农史学家、农业教育家和植物生理学专家

日前斩获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的《掬水月在手》，以独特的影像语言，诠释了古典诗词大家叶嘉莹先生提出的“弱德之美”。不少读者、观众、学者受感染而有所感悟，通过各种传媒渠道分享心得。

大家注意到，1993年，叶嘉莹从朱彝尊的《静志居琴趣》出发，提出“弱德之美”这一词之美感特质。一时间，朱彝尊仿佛被推崇成了“弱德之美”的代名词，令叶嘉莹先生本人颇感惊讶。叶先生为此特请她所喜爱和信任的《文汇报》发表声明：

我所提出的“弱德之美”，只

限于朱彝尊的《静志居琴趣》这一卷词。近代词论家陈廷焯所赞赏的朱彝尊的《桂殿秋》并不包括在内。朱彝尊以后所写的词——那时他的妹妹结婚之后再回到娘家与他又有所来往——也不包括在内。

叶先生愿以“弱德之美”这一词论原创者身份，通过本报给予这一概念最详细、最全面的梳理和解析。她尤推崇近代词人石声汉先生的《荔尾词存》，认为无论是词人还是词作，均完美体现了“弱德之美”。

石声汉（1907—1971），农史学家、农业教育家和植物生理学专家。叶先生与石教授并不相识。石

教授与南开大学前校长吴大任（1908—1997）是挚友。吴校长夫妇雅爱诗词，1979年起，每逢叶先生从加拿大温哥华飞回南开，他们便常来听课。以诗词为媒，以情感为缘，叶先生因而读到石声汉教授险些毁于故纸堆的遗作《荔尾词存》，动容之余慨然作序。

今日刊出的文章《何为“弱德之美”？》，即由该序专做整理而成。序言写于1998年，彼时石教授已殁27年，吴校长故去不久。如今虽又过20余载，但“弱德之美”的神奇之力，依旧能挽起先生与他们、我们与先生、我们与我们的情感链接。（江胜信）

就会发现，凡被词评家们所称述为“低徊要眇”、“沉郁顿挫”、“幽约怨悱”的好词，其美感之品质原来都是属于一种“弱德之美”，又说“就是豪放词人苏轼在‘天风海雨’中所蕴含的‘幽咽怨断之音’，以及辛弃疾在豪健中所蕴含的沉郁悲凉之慨，究其实也同是属于在外界环境的强势压力下，乃不得不将其‘难言之处’变化出之的一种‘弱德之美’的表现”。以上所叙写，乃是我多年来对词之美感特质加以反省后的一点认识。

而如今当我见到石教授以“忧谗畏讥”四个字为标题，来自叙其写词之经历与体会时，遂油然而产生了一种共鸣之感。我以为石教授所提出的“忧”、“畏”之感，与我所提出的“弱德之美”在本质上原是有着相通之处的，也就是说这种感受和情思都是由于在外界强大之压力下，因而不得不自我约束和收敛以委曲求全的一种感情心态。我实在没有料想到石教授以一位并非以诗词为专业的科学工作者，竟然能以其天资所禀赋的词人之心性，如此直接而敏锐的以个人一己直观的体验，轻易地就掌握了词之美感的一种最基本的特质。这自然是石教授

所提出的“忧谗畏讥”四个字之第一点可供沉思之处。至于第二点可供沉思之处，则是这四个字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还蕴蓄有一种丰富的内涵。它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之才人志士的一种普遍的心态。先就这四个字的字面而言，它就原是出于中国文化历史中之才人志士的一篇名作，那就是宋代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范氏文中所叙写的“忧谗畏讥”的心态，正是一位具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才人志士的“忧畏”，所以“忧谗畏讥”四个字所蕴含的，实在不仅只是一种自我约束和收敛的属于弱者的感情心态而已，而是在约束和收敛中还有着一种对于理想的追求与坚持的品德方面的操守的感情心态。其为形虽“弱”，但却蕴有一种“德”之操守。而这也正是我之所以把词体之美感特质，称之为“弱德之美”的缘故。

如果从石教授一生的为学与为人的持守和成就来看，他平生的一切可以说就都是在忧患困苦之中完成的。据姜义安先生所写的《春蚕颂——记著名古农学专家石声汉教授》一文中

之记叙，石教授曾在短短三年之内，就写了《齐民要术今释》97万字，《氾胜之书今释》58万字，《从〈齐民要术〉看我国古代农业科学知识》73万字；同时自己又把后两种书翻译成英文本，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在国外发行。当他的《齐民要术今释》于1958年将第四册陆续出完时，却正是石教授在国内政治运动中批判之时，但石教授却并未因此而放弃他的科研的志业和理想。1962年，他就又开始了整理《农政全书》的工作。当时他白天还担任着教学和培养研究生的工作，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来整理《农政全书》，而那时他还患着严重的哮喘病。但只要喘息稍舒，他就继续不断地工作。他终于完成了130余万字的《农政全书校注》，17万字的《农桑辑要校注》，还有《中国农业遗产要略》《中国古代农书评介》《辑徐衷后万草物状》等多种其他著作。而他最后的文稿甚至是写在烟盒纸和报纸边上面的，则其处境之艰苦可知。

姜义安先生把他所写的那篇纪念石教授的文章题为《春蚕颂》，一方面固然因为石教授的讲学与著述之工作，其所做出的贡献，真是如春蚕

之记叙，石教授曾在短短三年之内，就写了《齐民要术今释》97万字，《氾胜之书今释》58万字，《从〈齐民要术〉看我国古代农业科学知识》73万字；同时自己又把后两种书翻译成英文本，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在国外发行。当他的《齐民要术今释》于1958年将第四册陆续出完时，却正是石教授在国内政治运动中批判之时，但石教授却并未因此而放弃他的科研的志业和理想。1962年，他就又开始了整理《农政全书》的工作。当时他白天还担任着教学和培养研究生的工作，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来整理《农政全书》，而那时他还患着严重的哮喘病。但只要喘息稍舒，他就继续不断地工作。他终于完成了130余万字的《农政全书校注》，17万字的《农桑辑要校注》，还有《中国农业遗产要略》《中国古代农书评介》《辑徐衷后万草物状》等多种其他著作。而他最后的文稿甚至是写在烟盒纸和报纸边上面的，则其处境之艰苦可知。

石教授晚年还将视野转向亚洲海

吐丝之至死方休；另一方面也因为石教授自己曾写过以《春蚕梦》为题的十二首《忆江南》词。词前有一小序，石教授自谓此十二首词乃因其于“岁暮检书”之际，偶见其旧作《生命新观》之弃稿而作，则其以春蚕吐丝自喻其倾注心血以从事著述的喻意，固属显然可见。下面我们抄录其中的两首：

忆江南·丝（积稿）
抽不尽，一绪自家知。烂嚼酸辛肠
渐碧，细纾幽梦枕频移，到死漫徐丝。

忆江南·衣（成册）
裁制可，依梦认纤纤。敢与绣纨争
绚丽，欲从悲闷觅庄严，压线为人添。

这两首词从蚕之吐丝织帛而裁剪成衣，以喻写才人志士之撰述之积字成稿以至于装订成册。第一首词开端“抽不尽，一绪自家知”二句，是写蚕之吐丝一如人之由心血抽绎成篇。蚕之丝唯蚕自知，一如人撰述之用心亦唯人自知，故曰“抽不尽，一绪自家知”。至于“烂嚼酸辛肠渐碧”句，表面自是写蚕之嚼食桑叶，乃至通体变为碧色，而其所喻者则是人之生活虽茹苦含辛，而内心中所酝酿蓄积者，则为满腔碧血。至其下句之“细纾幽梦枕频移”，表面自仍是写蚕在吐丝时其头部之左右摆动之状，故以“枕频移”为喻，而另一面则“枕频移”三字却也正可以喻示人在撰述时之用心思虽就就就而不能安眠之状。只此“枕频移”三字已经把蚕与人之形象

和情思都写得极好，何况上面还有“细纾幽梦”四个字，“梦”就人而言，自可喻示其撰著所追求之理想；至于就蚕而言，则其一世之缠绵辛苦吐丝自缚所追求者，倘亦有一理想存于其间者乎。至末句结尾之“到死漫徐丝”五字，则写人生之苦短，如意之若苦，至死而仍意有所不尽，一如蚕之到死而仍有余丝，真是把才人志士的理想和悲哀写得如此之沉痛缠绵。至于次一首开端的“裁制可，依梦认纤纤”二句，则以蚕丝之裁帛制衣，喻示人之写稿成册，而“梦”则喻示所追求之一种理想，最后获得之成果自应求其与最初之理想相符合，故曰“依梦认纤纤”也。其下二句之“敢与绣纨争绚丽，欲从悲闷觅庄严”，则为石教授自写其辛苦之著述，并无在世间与人争求美名之意，而不过只是为了欲将所思所得贡献给人世的一点悲悯之心愿而已，然则此种工作之辛劳，岂不为一大庄严之事，故曰：“欲从悲闷觅庄严”也。而结之以“压线为人添”，乃是引用唐人秦韬玉《贫女》一篇中之“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诗句，写贫女之为人作嫁衣，以表示其一世之辛劳全是为他人而并非为一己个人之积业。至于“压金线”三字，则是写其积业之有待完成的工作之多。石教授这一组词全部以春蚕之吐丝、作茧、织帛、裁衣为喻，以自写其一生之辛劳工作之全部而全无为己之心意。喻象之美与托意之深，二者结合得既优美又贴切，既有词人之纤柔善感之心性，又有才人志士之理想与坚持，其所体现的品格与才质之美，也就正是石教授所提出的“忧谗畏讥”四个字之深层意蕴的另一点可供沉思之处。

以上我们是就石教授所自撰的“忧谗畏讥”一文，对其作为一个词人在品格和心性方面所具备的不平凡之处所做的一些探讨。而除去这些在本质方面的不平凡之处以外，石教授的词之所以使人感动和欣赏，实在还由

于他在题材之选择与表达之方式方面，也有一些不平凡之处。

石教授在1958年写给她长子定机的一页便笺上，曾经自叙说：“老蹇蹉跎五十一年，平和不甚以显达荣乐为怀，尤不欲人以词人文士见目。少年学作韵语，只以自写块垒。”只这一段话，就充分显示了石教授的词之所以迥异于一般人的不平凡之处了。因为就一般人而言，作为一个喜欢写作诗词的作者，总不免有两点习气，其一是对自己之作品常不免有矜持自喜之意，其二是在朋友间常不免有以作品为酬应之时。而石教授则绝无此两点习气，他在其词中所写的都是最真诚最深切的胸中之“块垒”，下面我们抄录他的三首词作：

清平乐
漫挑青镜，自照簪花影。镜里朱颜原一瞬，渐看吴霜点鬓。宫砂何事低徊，几人留住芳菲。休问人间谣诼，妆成莫画蛾眉。

柳梢青
缝线残春，簪花掠鬓，坐遣晨昏。臂上砂红，眉间黛绿，都锁长门。垂帘对镜谁亲？算镜影相怜最真。人散楼空，花凋镜黯，尚自温存。

前调
休问余春，水流云散，又到黄昏。洗尽铅华，抛残翠黛，忘了长门。卷帘斜日相亲，梦醒后翻嫌梦真。雾锁重楼，风飘絮絮，何事温存。

这三首词，据石教授所言，乃是他就读了王国维之《人间词》中的《虞美人》（碧苔深锁长门路），及《蝶恋花》（莫斗婵娟弓样月）两首词后的有感之作。王氏之词所写的，乃是以闭锁长门的蛾眉自喻，慨叹于谣诼之伤人，但在被伤毁和被冷落中，词人却仍坚持着一种“且自簪花坐镜中人”的不甘放弃的理念，这种心态自然正是石教授所说的属于“忧谗畏讥”，也就是我所说的“弱德之美”的感情心态。而这自然也正是石教授何以会被王氏的这两首词所感动的缘故。不过石教授由此一感词所引发的三首词，则已经超越了王氏原词中的心态，而更增加了反复思量之多层意蕴。从怅惘于“芳菲”之不能“留住”，到“花凋镜黯”而仍不肯放弃的“尚自温存”，再转到“梦醒”后之彻底放弃的“何事温存”，这其中石教授所表述的情思和意念，真可以说是幽微要眇百转千回，像这种题材和意境，岂止不是一般以文学为羔雁之具的人所能企及，也不是一般只会写伤春悲秋以诗酒风流自赏的词人文士所能达致的。

传统题材和现代题材都能驾驭，短令长调均擅长，抒情和咏物皆动人，总之石教授之词，在现代之作者中，其成就极为难能可贵，足可自树一帜。前南开大学校长吴大任先生曾在纪念石教授的《怀声汉》一文中写道：“我希望这些词及其笔迹将作为文化遗产永远保存。”我与吴校长有相同的愿望。



理查德·哈库利特的“经略海洋”史

孙超

哈库利特是谁？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名字。

理查德·哈库利特1552年出生于伦敦一个皮革商家庭。年幼丧父后，受资助去牛津大学读书。1568年，他拜访了同名的表兄——律师哈库利特。后来他如此回忆这次拜访：“当时，一本宇宙学的书在他的桌子上摆放开来，边上还有一幅世界地图；他见我好奇，便给我讲解开来。”这段情节成为英国海洋史中的一个经典时刻，被视为英国人研究“经略海洋”问题的开端。

1588年，英国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事件，给予整个英国极大的信心，政治层内“经略海洋”派群体崛起，给予哈库利特的研究事业以巨大支持。1620年，哈库利特撰写的《英国民族的伟大的航程、旅行与发现》全文出版。这部《伟大的航程》已成为早期英国帝国史书写的“原典”。但是，在19世纪麦考莱史学传统的影响下，英国人所认知的历史学主要用于处理国内问题和欧洲权力关系，这部书往往被归为地理作品。近年来，后现代历史学摆脱了特定史料的束缚，人们发现哈库利特的作品就是一部近代早期人类的文化冲突史和文明交往史，由是，哈库利特得以以历史学家身份进入学术界视野。2016年，牛津大学纪念这位海洋史上的经典作家逝世400周年，学者们从各国角度论述哈库利特著作中的本国形象，这次会议也是哈库利特首次以“全球史家”身份进入历史学叙事。在经历了19—20世纪的低潮后，全球化进程又让“哈库利特热潮”重返学术舞台。我们有必要重新理解哈库利特是如何在不列颠海洋帝国成长的初始阶段界定了英国人的时空记忆和帝国观念的。

面 对西班牙海洋帝国的成就，哈库利特在1587年开启一项计划“以有序的方式收集我们国家的海洋材料……为了让子孙后代知道，他们今日享受的一切源自他们父辈的努力，并且这样他们可以激励他们抓住机会大干一番”。到1589年秋天，《伟大的航程》第一部分出版，包括了1000多年的英国航海史，可看作这一心愿的一次了却。哈库利特想证明英国航海业的古老性，开篇即谈到，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海伦娜在公元337年前往耶路撒冷旅行是英国航海业的开端。他也提出这是中世纪的英国人首先发现了美洲，证据是所谓的威尔士王子马多克在1170年去佛罗里达的传闻——证明不列颠人比哥伦布或韦斯普奇更早到达美洲。

哈库利特把西班牙作为英国的参照物。他为此翻译了西班牙史家皮埃特罗·马蒂尔·丹吉埃拉的名著《新世界几千年》，并在给沃尔特·雷利爵士的信中盛赞了这种新世界史写作的意义：“他用最庄严的方式，给美洲披上了拉丁的外衣，从而让世界都能了解它。”哈库利特的翻译工作隐含着他对英国在16世纪殖民开拓热潮中落后现状的惋惜之情，他希望英国人能够学习西班牙的先进经验，为此，他提出了学习西班牙海洋史的三重意义：可以帮助英国人获得殖民开拓的勇气；能够获得丰厚的经济回报；也是英国人获得灵魂拯救的方式。

不过，由于西班牙在16世纪后期给英国海洋国家安全造成巨大威胁，哈库利特对于西班牙海洋帝国建立的历史也

持有批评态度。他翻译了西班牙传教士拉斯·卡萨斯的著作《西班牙的征服》。在该书前言部分，谈及西班牙的“残暴”统治给欧洲带来的恐惧。他进而提出，英格兰不应当惧怕西班牙，反而应该在美洲建立殖民地，因为“如果我们锐利的双眼能够看穿西班牙的弱点，并且下定决心用优势兵力在世界面前揭穿他们，西班牙人将成为世界的笑柄”。

通过对大量史料的搜集整理，哈库利特的海洋史书写重塑了英国人对海洋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自信。在他笔下，近代以来的英格兰正在重建海洋国家，一方面要向先进的西班牙学习，另一方面又无需惧怕它。哈库利特以民族记忆的捍卫者自居：“（我）为我们国家的利益与荣耀辛劳多年，我游历各地且耗费不少，只为了将淹没无闻的古老之物带入到光明之中，只为了我们英格兰民族近年来在探险方面的某些记忆不至于被贪婪的消亡之牙给吞噬掉。”

1583年，哈库利特在纪念海上溺亡的好友帕美纽斯时感叹：“海洋的广度有何，广度有几分他们远离了陆地！……海洋的牙齿吞没了无数的生命，这只需一小会儿。”或许是受此影响，哈库利特在读到《圣经·诗篇107》中上帝在海上行奇迹拯救遇难者的故事时深受感动，并表示自己之所以从事海洋史的书写工作是受到了《圣经·诗篇107》的启示：“我在其中读到，他们乘船深入大海，他们在伟大的成果中活动，他们在深海中寻找我的成果和奇迹。”这

句话被认为是在“英格兰爱国主义的一次宣言”，因为在哈库利特的著作中，这种海洋探险带来的不仅是危险和拯救，还有新的空间意识。

首先，在全球扩张阶段，哈库利特重新定位了不列颠岛的位置。哈库利特意识到，英格兰的特点是“为海洋所环绕”，英格兰的历史是“王公们跨越大岛征伐四方”的过程，都凭借了英格兰岛的位置优势，即北大西洋航海虽然有着“巨大的艰难和十足的痛苦”，但也“享受夏季持续晴朗的白天而无黑夜之幽暗”。哈库利特也指出英格兰具有的劣势，即过分重视农业以及与欧洲大陆过于密切的关系。他以历史上雅典的优越性为例说明，英格兰人应该把自己的城市想象成岛屿，把自己想象为岛民，允许自己抛弃陆地农业，“谁掌握了海洋，就掌握了贸易；他就会成为世界贸易之主，世界财富之主”。

之后，哈库利特按照方位提出了英格兰对西部美洲和东亚亚洲实行不同地缘战略的构想。在哈库利特看来，北美的战略意义在于它将为英格兰提供充足的物质资源，从佛罗里达可以进口枣、柏木、香料以及大量珍珠和金子。他在论述英国在历史上与北美地区的关系后认为，“从佛罗里达到北纬67度之间美洲的所有权”是当初英国国王通过授予塞巴斯蒂安·卡波特特许状时确定下来的，而且这片领土“距离（伊丽莎白女王陛下的）王国要比距离欧洲其他国家近得多”。

哈库利特晚年还将视野转向亚洲海

域，格外关注英国与东方国家的关系。他记载了约翰·纽伯里在1583年携带伊丽莎白女王书信给中国皇帝这件事情。女王在信中表示：“我西方诸王从相互贸易中所享受之利益，您及您的治下之臣属当一体享有。我们既向您输出我们所需之物，也会输入我们需要之物。鉴于我们互相需要，亦当互相支持。”这封信虽然最后没能送到万历皇帝手中，但显示了英国人对于建立中英贸易关系的强烈心情。

另外，哈库利特对于英国在大西洋内部北方和南方也有着不同的发展战略。由于南部大西洋最先为西班牙和葡萄牙人所开辟，英国人几乎无法染指南美洲大陆，所以他认为英国应该关注非洲，达到排挤葡萄牙人的目的。对当时英国开拓的重点区域北大西洋，则采纳荷兰学者格劳秀斯的“海洋自由”观念。哈库利特认为1551年英国经东北航线建立与莫斯科的贸易关系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应该沿着俄罗斯北部边缘，然后再顺着北海的海岸南下最终打通东北航线，从而实现东西方世界商品自由交易。在哈库利特著作中，不列颠岛周围直到北美的大西洋海域是属于英格兰的“封闭之海”，不容他人染指，所以他提出了防止荷兰、挪威和苏格兰“侵犯”英国北海渔业权和北美殖民地独占权的措施。

正如布罗代尔所说，1558年英格兰丢失加莱城后，“英国不知不觉地变成……一个岛屿，即一个与大陆隔离开来的独立地域”。这种海岛心态将英国从欧洲边缘地带拉到了北大西洋的中心位

置；不列颠西部海域由英格兰独享；亚欧大陆的东方海域则是奉行“自由海洋贸易”的寄托所在；北方海域是打通通向东方海域的路径；对南方海域保持谨慎态度，但在合适时期，准备随时干预非洲和南美洲。

虽然哈库利特对于建立海洋帝国秉持强烈的渴求态度，但他对于不列颠帝国的扩张又心存疑虑。构建“完美的共同体”而不是所谓的扩张型帝国，才是他的终极目标。与19世纪英国人所追求的全球海洋帝国的理念不同，哈库利特的海洋帝国是一种有限帝国观念，范围主要集中在北部大西洋区域。在帝国区域内部追求独享的权力，而帝国外部更多地追求和平的贸易。哈库利特希望英国的海洋帝国是与西班牙的领土帝国不一样的商业帝国。在他看来，贸易的背后不一定是殖民活动，与亚洲的良好商业关系是英帝国的追求。这种帝国战略是出于英帝国当时实力的理性考量，无须过分美化，因为就在1620年，为保护英国在俄罗斯的贸易利益，英王詹姆士一世曾认真准备对俄罗斯的军事远征，一度想把莫斯科纳入自己“帝国”的范畴。世界历史中常见的贸易帝国军事征服的帝国主义模式很快就出现了。

总之，哈库利特通过为新生的英帝国作传，重构了英国人对“经略海洋”的历史记忆，并且强调英国自我定位应从欧洲大陆边缘地带转变成为北部大西洋的核心地区。400年来，英国至今仍是重要的海洋国家，而在英国“经略海洋”历程的谱系中，哈库利特是一位开拓者，也是英国海洋民族观念的一位缔造者。